

公共政策文本研究的路径与发展趋势^{*}

任 弢 黄 萃 苏 竣

[摘 要] 作为公共政策文本的文件,在中国政治运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从公共政策文本概念出发,厘清了政策文本研究的逻辑基础、评析了既有的公共政策文本研究的五种路径,总结出公共政策文本研究正在经历定量化、大数据化和归因化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 政策文本;文本研究;社会网络;研究路径

[中图分类号] D0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0863 (2017) 05-0096-06

一、公共政策文本的再认识

公共政策是政府、政党及其他政治团体在特定时期为实现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目标所采取的政治行动或所规定的行为准则,它是一系列理念、谋略、法律、命令、措施、方法等的总称。^[1]

公共政策文本则是公共政策存在的物理载体。^[2]从最广义的角度来说,所有能够反映公共政策的文本都可以被视作公共政策文本,也就是一般意义上的政治语篇,包括政体(polity)、政治家(politician)与其他政策参与主体发布的讲话、研究报告、议会辩论以及法律、法案等法定文书等。^{[3][4]}

公共政策的程序性特征要求公共政策必须受到既定程序的约束,^[5]公共政策文本形成自然也必须遵循一定的流程。有学者指出,在中国完善的文件制度下,公共政策文本的形成一般要经过7个程序:(1)提议(initiation);(2)确定起草者(selecting drafter);(3)上级指示(top-down directives);(4)研究酝酿(research and drafting);(5)修改(revision);(6)批准(approval);(7)颁布实施(dissemination),其中(3)到(5)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6]

如表1所示,公共政策文本的形成程序可以与公共政策的一般过程相对应。

有学者在《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规定的基础上,对公共政策文本从功能上进行了分类,即将公共政策文本分为:政治文件、管理文件和信息文件,其

表1 公共政策文本与政策阶段

政策过程阶段	公共政策文本形成程序	政治语言表述
认定元问题	提议、确定起草者	确定工作重点、成立起草小组
信息获取与分析 确认和细化问题 目标确立 制定备选方案 方案评价	上级指示 研究酝酿 修改	调查研究 征求意见 听取领导指示
政策合法化 政策的执行、修正与终止	批准 颁布实施	贯彻落实

注:政策过程阶段划分参考Dunn、^[7]苏竣,^[8]公共政策文本形成程序参考Wu^[9]

中政治文件以意识形态为主题,指导具体行政活动;管理文件则旨在解决具体问题;信息文件则是发挥沟通交流作用。^{[10][11]}也有学者概括了公共政策文本的四大功能即政治控制、蓝图规划、行为规范和任务布置功能,^[12]此外,还有学者指出,中国的公共政策文本事实上承担了法律约束功能,作为“其他规范性文件”在行政法层面上具备法律效力,^[13]同时,在中国法制建设进程中,政策法律化是一个重要趋势,换言之,文件起到了立法预备的功能。^[14]

尽管当前很多研究对公共政策文本功能进行了讨论,但是这些讨论模糊了公共政策文本功能与公共政策功能的区别。例如,立法预备功能显然是指向公共政策而非公共政策文本的。因此针对公共政策文本的功能试做以下归纳。

^{*}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基于若干领域的中国公共决策模式及其现代化路径研究”(编号:71233005);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合作项目“决策模式差异化情景下的中美低碳创新政策工具比较研究”(编号:71520107005);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2016-2017

作者:任弢,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黄萃,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苏竣,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084

首先,公共政策文本作为“传达贯彻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公布法规和规章、指导、布置和商洽工作,请示和答复问题,报告、通报和交流情况等的重要工具”,具备信息传递与沟通功能。文件制度诞生之初就是作为一种政治沟通制度存在的,^[15]因此信息沟通与传递功能自然是其题中应有之意。由于中国政治沟通具有高度一元化特征,^[16]公共政策文本又由此派生出了信息控制功能,文件传达链条也反映出官僚权力流向。^[17]

其次,公共政策文本作为政治仪式的符号,具有价值宣示功能。符号互动论指出事物的意义往往不在于事物本身的世俗功用,而是在于事物的象征意义。公共政策文本作为政治言说行为的象征,其存在本身就能够反映出决策者的价值取向。举例而言,中央一号文件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其具体内容表述上,更为重要是一号文件颁布本身就能够体现出决策者的价值取向。

最后,公共政策文本作为文献资料,天然具备一般文献资料所具有的记录功能。因此,一方面,政策文本能够作为政策执行和绩效评估的重要依据,另一方面,政策文本也成为了政策主体调控和管理行为的“印迹”,是政策过程可记录、可追溯的客观反映,为观察政策过程提供了一扇窗口。

二、公共政策文本研究的逻辑合理性

无论是西方世界还是中国,政治权力出于自我保护都会倾向于隐藏决策信息,^{[18][19]}因此,如何打开决策过程的黑箱就成为政策研究者们共同关心的问题。

随着19世纪中期实证主义的兴起,早期缺乏“科学性”的公共管理学和公共政策学也迎来了科学化浪潮。^[20]所谓科学化,实质上是遵循实证主义的基本预设即通过观察研究对象的外在行为获知规律,进而做出科学推论。为了实现对研究对象的观察,就必须对诸多人为建构的理论概念进行操作化,将抽象的概念转化为可以描述的指标。

出于研究问题的差异或者客观条件的限制,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学者们通常会针对同一概念选择不同的指标。在打开决策过程黑箱的过程中,对于政府行为这一关键变量的测度,在以往的研究中就至少出现了以下三类测度方式。

第一类测度方式是通过观察政府组织领导人和主导者的个人行为与动机来分析政府行为。^[21]尽管这种方式简单易行具备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批评者认为以个人行为代替组织行为的测度损失了诸如组织文化、制度环境、人际互动等信息,存在较大的误差,在无偏性和一致性方面存在明显的不足。

第二类测度方式则是通过对大量组织成员进行访谈或问卷调查对组织行为进行刻画,以打开决策过程黑箱。因此这类观测实质上基于这样的假定:内部人能够准确观察组织行为,研究者通过观察内部人或的关于组织行为的信息。但是,由于观测链条较长,并且在两次观测过程(尤其是内部人对组织行为)中都存在

主观误差,并且需要使用通过其他方式获得的数据进行交叉验证。^[22]

第三类观察方式直接以组织本身为观测对象,试图以组织外在特征刻画组织行为。具体而言,研究者用政府组织的规模、政府组织预算、政府或政府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来刻画政府的行动。而公共政策文本则可以作为这类观测对象,帮助研究者开展公共政策研究。

Wu指出,公共政策文本是一小群决策者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彼此之间形成共识,将个人偏好正式化,并通过形成政治语篇以获取意识形态合法性的产物,因此公共政策文本不仅反映了政策结果,同时也反映了政府决策过程中的过程性信息。^[23]可以说,公共政策文本作为政策的物化载体,是政府行为正式的、系统的、可追溯的文字记录,形成政府调控和管理行为的真实“印迹”,成为政策分析的事实依据。公文的制定与运行过程,是政策意图形成和实施的客观呈现,具备成为观测指标所必须的替代合理性。

其次,公共政策文本作为观测指标,也具备良好的数据可编码性。《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和《党政机关公文格式》(GB/T9704-2012)对格式做出了具体的要求。为对公文数据进行结构化编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研究者能够对公共政策文本进行标准化的结构化处理:将公共政策文本拆分为标题、颁布机构、行文时间、正文、主题词等不同字段。同时,公共政策文本行文用语受到诸多限制,因此词汇量与语法结构均相对简单,这使得对其进行文本分析的难度大大降低。

最后,作为观测指标的公共政策文本也具备良好的数据易得性。随着中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不断深化,大量公共政策文本已经向公众和研究者开放。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专门开通了文件搜索功能。^①除了政府部门的主动公开外,越来越多的研究机构也开始开展公共政策文本的收集整理工作,除了综合性的法律文件检索平台北大法宝外,也有学术机构和研究者根据自身研究需求整理出公共政策文本数据库。^②

公共政策文本作为数据来源有其独特优势。首先,正如上文所述,公共政策文本是政府活动和政策过程自然形成的印迹,因此,公共政策文本研究与问卷调查、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相比,能够减少研究者介入造成的测量误差,从而提高测量的信度。其次,尽管公共政策文本与统计数据一样都是客观统计数据,但统计数据将政府行为抽象为一组数字时,损失了大量情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文件搜索网址: <http://www.gov.cn/zhengce/>。

② 例如清华大学政府文献中心采集了从1949-2013年的中国中央与省级政府公共政策文本120余万件并对这些文本进行了结构化数字处理,建成了政府文献信息系统。该系统目前为研究者提供公益性查询服务。这些丰富的数据来源使得研究者能够更为便捷的获取公共政策文本。清华大学政府文献信息系统入口: <http://166.111.100.4:8080/qhgg/>。

境性(contextual)信息,而在公共政策文本中,这些情境性与解释性信息都能得到保留,从而能够提高研究的效度。

综上所述,公共政策文本作为研究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问题的切入点在逻辑上具备合理性,在操作中具备可行性。

三、公共政策文本研究五种路径辨析

公共政策文本能够为研究者提供观察政府行为和政治过程的窗口。根据研究侧重点和研究逻辑的不同,公共政策文本的研究路径可以分为以下五类。

(一)语义学与语法学路径

关于文本的研究最初都是语义学研究。语义学关注的是“说的是什么(What is said)”的问题,即关注文本中基本语素本身,而不考虑文本所处的语境。^[24]

在对政治语篇和公共政策文本的研究中,早期的语义学家往往考察语篇中存在异义的抽象词语如民主(democracy)、主权(sovereignty)、共产主义(communism),试图讨论这些概念的来龙去脉及其外延与内涵,从而说明文本本身究竟要表达什么意思。^{[25][26]}这类研究往往会最终走向政治哲学的概念辨析或者纯粹的训诂学。^[27]

在对中国的公共政策文本研究中,语义学研究多集中在公共政策文本的翻译问题上,语言学家们往往对公共政策进行语义分析的目的在于更好地对这些语料进行翻译,^[28]由于这类研究的研究问题并不与公共管理相关,因此暂不讨论。公共管理学者们则多对《政府工作报告》等重要公共政策文本中的高频词或特定概念表述进行分析,从而分析政府对特定政策问题的态度立场。^{[29][30]}除此之外,也有学者利用公共政策文本语义分析进行跨国比较,通过对中外公共政策文本(如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与美国《国情咨文》)的主题词进行比较,考察不同国家政府在不同意识形态下的工作重点差异。^[31]

在语法学范畴内,也有学者将公共政策文本作为研究对象。纯粹的语言学家从语篇衔接结构、特殊句式与句法结构展开研究,其目的是提高政策文本表达的准确程度与见简洁程度,^{[32][33]}这里暂不讨论。在公共管理与政策领域,有学者句式结构角度提出公共政策文本解读的理论框架:首先分析公共政策文本语句构成,将语句分为“实是”、“评价”、“行动”、“后果”四类语句,对每类语句进行有效性分析和语句构成系统性分析,从而客观地解读公共政策文本。^[34]

语义学和语法学路径的语言学特征较为明显,因此,这两类研究中的公共政策研究并不多见。仅有的一些公共管理研究或转向了政治哲学讨论,或仅停留在文本解读层面。尽管研究者提出了将这些研究发展为比较研究或是科学文本分析研究,但由于缺乏对可比性的建立或明确编码规则,这些研究对公共管理与政策科学发展的贡献相对有限。

(二)语用学路径

语用学研究的是“表达的是什么(What is implicated)”这一问题。简单来说,语用学与语义学和语法学最大的不同在于加入了情境,换言之,语用学考虑语言使用双方之间的关系与文本内上下文的关系,重点关注文本中的代词、连词、隐喻、情态与弦外之音等。

语用学中的批判话语分析框架(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对公共政策文本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批判话语分析关注语言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其基本预设是语言能够反映社会中的权力关系,通过对话语的分析,能够揭示话语中暗含歧视与偏见,观察话语背后的意识形态与动机,从而理解社会过程。^{[35][36]}换言之,CDA使得文本与社会行为之间建立了关联,也正是因此,在对公共政策文本的语用学研究中出现了大量社会科学研究而非语言学研究。

西方学者以广义的公共政策文本为分析对象,通过辨析政治领袖讲话或议会辩论材料中的“预设”“暗指”“比喻”等概念,考察公共政策文本后的价值取向。^[37]例如Dijk通过分析西方议会记录中的代词Others,考察了对于少数族裔的内隐歧视。^[38]此类研究还有通过分析立法文本中的特定表述考察立法者同性恋群体的不同态度^[39]等。在中国的公共政策文本研究中,有学者基于《政府工作报告》《人民日报》等文本从语用学角度研究了“农民工”、“雷锋”等词汇的预设与暗指,探究了社会观念变化与政治价值变化。^{[40][41]}总体而言,这类研究从代词或特定名词入手,挖掘文本背后的政策目标与价值原则。

此外,也有研究从语言风格的角度对政策文本进行解读。Bhatia分析江泽民主席与布什总统双边会议公报文本,发现其中存在肯定性语言、劝说性语言和回避型语言,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美两国领导人在不同议题上的态度倾向。^[42]中国有学者借鉴这一框架,通过分析国企改革中的关键公共政策文本,对文件治国的机制进行了讨论。^[43]除了对文本进行解读与分析外,还有学者试图在语用学分析的基础上,寻找文本与社会运动之间的相关性。^[44]

由此,语用学路径的公共政策文本研究将文本与社会事实联系在一起,赋予文本以社会意义。通过对文本中的内容风格研究,探求文本后的政治价值。语用学的研究也构成公共政策解读的基本方法,尤其是其中的CDA分析框架已成为政策文本内容研究的主流范式。语用学路径的主要贡献是推动了政治学和社会学中关于权力、平等、种族等宏大命题的研究。

(三)政策内容路径

上述两种公共政策文本研究,其分析单元是政策文本中的具体内容,对文本内容的编码或基于语言的原初含义,或基于文本的情境含义。政策内容研究的分析单元尽管也是政策文本内容,但是其编码是基于文本内容的政策学含义。

政策内容路径在对文本进行编码时,主要基于文本内容所指代的政策意义,即将基本语素组合成具有政策含义的短语、句子或段落,通过对这些短语、句子或段落进行分析得出具有公共政策学价值的结论。

Laver et al 发表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上的研究在方法论上推动了政策内容研究的发展。在该研究中首先收集了爱尔兰、英国和德国议员在立法演说记录,从这些记录中抽取了特定词汇,对其进行编码后进行了简单的频次统计以刻画议员们的政策立场。^[45]其方法论意义在于,不再将政策文本视作是需要加以解读诠释的语篇,而是将政策文本视作文字形式的数据,其基本研究路径是将文本数据通过编码过程转化为统计数据进而运用各种统计分析技术开展实证研究。

中国公共管理学界也有相当数量的研究沿着这一路径,将公共政策文本视作文字数据加以转化和分析,但与西方关注政治心理和政策立场变化不同,中国政策内容路径研究聚焦于政策工具与组合理论。

政策内容路径研究通常要解决的政策研究问题是:政府针对某一政策问题采用了哪些政策工具和政策工具组合?这些研究在收集某一具体政策领域(例如风电产业发展、体育产业等)政策文本的基础上,根据政策工具的相关理论,对政策文本中的特定表述进行编码,将其提取为不同的政策工具类别,再通过简单的频次统计刻画这一领域中政策工具的基本使用情况,通过分析政策工具类型、变化和组合,从而发现政府使用政策工具的内在规律,为进一步的政策效果评估奠定基础。^{[46]-[48]}

这些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能够较客观和全面地描述特定领域政策工具的使用情况,为研究政策组合(policy mix)提供了支撑,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政策工具理论研究的实证化发展。

(四)文献计量路径

文献计量路径从研究方法上引入了图情学的分析方法,重点分析公共政策文本的非内容要素,如文本数量、主题词、发布时间等“外部”属性,试图描述政策议程设置和政策注意力。事实上,文献计量路径在公共政策研究中并非新鲜事物。早在 Baumgartner 和 Jones 提出间断均衡框架时,其研究就是通过对新闻报道进行文献计量从而描述政策注意力变化的。在中国,与新闻报道相比,政策文本能够更加直观地反映政府注意力和政策议程。

有学者将公共政策文本的颁布数量为研究对象,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行政年历”概念,“行政年历”是指地方政府一年内所发布的文件在数量上呈现出的特定规律。“行政年历”研究将文件作为研究视角,通过归纳文件这种数量上的规律,研究政府的行政行为和行政过程。具体而言,“行政年历”研究关心的是某一政府特定时间段内发布的公文数量,通过对公文数量进行分发时间、分部门、分领域的频次统计,对应开展

自然序、叙事序和强度序分析,进而说明政策主题变迁、部门职责变迁和热点领域变迁。^{[49][50]}

除了政策文本数量外,政策文本中的主题词也是学者们关注的对象。主题词是用以揭示公文主要内容的规范化和标准化的词或词组,类似于科技论文中的关键词,因此,有学者将文献计量方法迁移至公共政策文本研究中,通过对公共政策文本主题词进行文本聚类分析,反映政策主题热点与主题变迁轨迹,描述和印证了中国政府执政理念的转变。例如,学者们对科技政策、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政策、学校体育政策等具体政策领域研究了政策注意力变迁。^{[51][52]}

(五)社会网络路径

有学者指出,中国的公共政策研究呈现出“地强央弱”的特点,即关于地方政府和央地关系的研究较多,而针对中央政府部门的研究则较少,这主要受制于中央政府部门数据有限。^[53]公共政策文本的社会网络路径为改善这一情况提供了可能。

为考察中央政府部门间关系,研究者将目光投向了一类特殊的公共政策文本:联合行文文件。根据《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规定“同级党政机关、党政机关与其他同级机关可以在必要时联合行文”。在联合行文中,一份政策文本会有两个或以上颁布机关,因此,根据联合行文行为构建出联合行文单位间的合作关系。这一网络以政府部门为节点,联合行文频次为连线的网络,以此描述政府部门间的合作关系,揭示某一政策领域的政府活动规律及其动因。^{[54]-[56]}

与通过联合行文文件构建政府部门合作网络类似,关注地方政府间关系的研究者将目光投向了跨域治理中的府际协议。通过构建以地方政府为节点,缔约关系为连线的网络,来刻画地方政府的横向府际关系。通过比较不同网络的密度、中心势等参数,分析地方政府跨域合作的机制。此外,也有学者根据批转、转发文件等行为构建了纵向府际关系网络。基于政策文本构建出的政策主体间的关系网络为描述政府(部门)间关系提供了一个可能的途径,对府际关系、跨域治理、部门协同等问题具有推动作用。

除了政策主体间关系外,社会网络路径也为研究政策体系提供了新的分析途径。王海鑫通过分析文件之间的引用关系,构建了以政策文本为网络节点,引用关系为连线的有向网,对政策之间的关联进行了量化描述,反映出政策意图的继承、发展和进步的脉络。^[57]这一探索性研究对于政策评估和政策体系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四、公共政策文本研究的发展趋势

公共政策文本研究路径从语言学路径到社会网络路径的变化反映出公共政策文本研究的三个发展趋势:量化、大数据化与归因化。

从研究范式来看,公文研究经历了从质性文本解读到定量数据分析的变化。公共政策文本研究在早期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依赖于语言学的分析方法,使用文本解读等质性研究方法。随着公共政策文本研究逐渐从语言学研究转为公共管理学研究,加之社会科学领域量化浪潮的社科影响,研究者通过对政策文本的内容特征或者文献属性特征进行编码展开定量研究。当下社会网络分析的流行也促使研究者尝试进行了拓扑结构分析、网络回归分析等更为复杂的数量分析。可以想见,随着学科知识进一步交叉,公共政策文本研究中还将出现更多量化的分析手段和方法。

从研究的观测数量上来看,公共政策文本研究经历了从孤立样本到大数据的变化。以语法学、语用学和语义学路径受到研究方法的要求,通常将研究对象设定为一个或数个政策文本语篇,通常是关注这些个别语篇中的内容要素。文献计量路径和社会网络路径涉及公共政策文本数量都达到30以上,在一般意义上成为了大样本研究。其中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作为与大数据匹配的分析技术,则对文本数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一篇研究中涉及的文本通常是相关的全部政策文本,即从“有代表性的样本”向“总体”转变。这种研究样本的数量变化变化不仅反映出公共政策文本研究分析技术的进步,也深刻地反映出了大数据时代公共政策研究关注点从实体(entity)向关系(relation)的转向。

从研究层次来看,公共政策文本研究经历从描述性研究到解释性研究的跃迁。绝大部分公共政策文本研究试图通过定性或定量的方法呈现出政府意图或政府行为“是什么”,其贡献在于寻找到恰当的指标来刻画政府意图、活动和政策过程,而并不涉及到其他变量也没有对这些意图、活动与政策过程进行解释。但近年来社会网络路径中的网络回归或整体网指标将文本数据与一般公共政策研究中的其他数据连接在一起,使得文本中的数据也能进行回归分析,从而则为运用公共政策文本进行解释性研究提供了可能,可以想见,探寻因果机制将会成为公共政策文本研究的主流,而公共政策文本研究也会进一步丰富公共管理学科知识体系。①

参考文献

- [1][5][8] 苏竣. 公共科技政策导论[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4.
- [2] 黄萃, 任弢, 张剑. 政策文献量化研究: 公共政策研究的新方向[J]. 公共管理学报, 2015(2).
- [3] Connolly W E. *The Terms of Political Discours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3.
- [4][36][38] Dijk T V. *Discourse as Social Interaction*. Sage, 1997.
- [6][9][23] Wu G. Documentary Politics': Hypotheses, Process, and Case studies. *Decision-Making in*
- Deng's China: Perspectives from Insiders*, 1995: 24-38.
- [7] Dunn W N. *Policy Analysis: Perspectives, Concepts, and Methods*. 6. Jai Pr, 1986.
- [10] 谢岳. 文件制度: 政治沟通的过程与功能[J].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6).
- [11] 施从美. “文件政治”: 当下中国乡村治理研究的新视角[J]. 江苏社会科学, 2008(1).
- [12] 潘同人. 中国文件机制初探[J]. 理论导报, 2011(1).
- [13] 王景斌, 顾颖. “红头文件”违法之原因及对策论析[J]. 行政与法, 2005(11).
- [14] 陈潭. 浅论政策合法化与政策法律化[J]. 行政与法, 2001(1).
- [15][17] 景跃进. 中国的“文件整治”[M].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公意的边界.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 [16] 俞可平. 政治沟通与民主政治建设[J]. 社会主义研究, 1988(2).
- [18] Wodak R. *Language, Power and Ideology: Studies in Political Discourse*.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1989.
- [19] Chilton P. *Analysing Political Discourse: Theory and Practice*. Routledge, 2004.
- [20] Horkheimer M. *Eclipse of Reason*. 1. Bloomsbury Publishing, 1974.
- [21] Allison G T, Allison G T, Aguero Martinez M O, et al. *Essence of Decision: Explain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e-libro, Corp., 1971.
- [22] King G, Keohane R O, Verba S. *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Scientific Inferenc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 [24][25] Grice H P. Utterer's Meaning and Intention.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1969: 147-177.
- [26] Gallie W B. Essentially Contested Concepts. *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 1955: 167-198.
- [27] Glendon M A. *Rights Talk: The Impoverishment of Political Discourse*. Simon and Schuster, 2008.
- [28] 狄艳华, 杨忠. 基于语料库的中国政府工作报告核心主题词研究[J]. 外语学刊, 2010(6).
- [29] 林超群. 我国政府海洋意识变迁研究[D]. 中国海洋大学, 2014.
- [30][40] 黄晓赞.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地位变迁的政策研究——基于近五年(2010-2014)政府工作报告的分析[J]. 职教论坛, 2014(11).
- [31] 李响. 中国《政府工作报告》和美国《国情咨文》的主题词对比研究[J]. 长沙大学学报, 2012(3).
- [32] 蔡绿妍. 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把”字句翻译[J].

- 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6).
- [33] 曾剑平, 汪华. 试析语篇衔接手段在政府工作报告翻译中的应用[J]. 南昌航空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3).
- [34] 杨正联. 公共政策文本分析: 一个理论框架[J]. 理论与改革, 2006(1).
- [35] Fairclough 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 Critical Study of Language. Language in Social Life Series.* London: Longman, 1995.
- [37] 杨敏. 西方政治语篇分析的语用学视角[J]. 中国外语, 2011(2).
- [39] Hutchinson D L. Out Yet Unseen: A Racial Critique of Gay and Lesbian Legal Theory and Political Discourse. *Conn. L. Rev.*, 1996, 29: 561.
- [41] 杭树志. 纸上雷锋的五个十年:《人民日报》“学雷锋”文本流变考[D]. 云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3.
- [42] Bhatia A.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of Political Press Conferences. *Discourse & Society*, 2006, 17(2): 173-203.
- [43] 郭毅, 王兴, 章迪诚等. “红头文件”何以以言行事?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文件研究(2000~2005)[J]. 管理世界, 2010(12).
- [44] Koopmans R, Statham P. Political Claims Analysis: Integrating Protest Event and Political Discourse Approaches. *Mobilization: An International Quarterly*, 1999, 4(2): 203-221.
- [45] Laver M, Benoit K, Garry J. Extracting Policy Positions from Political Texts Using Words as Data.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03, 97(2): 311-331.
- [46] 李燕萍, 吴绍棠, 郜斐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研经费管理政策的变迁、评介与走向——基于政策文本的内容分析[J]. 科学学研究, 2009(10).
- [47] 黄萃, 苏竣, 施丽萍等. 政策工具视角的中国风能政策文本量化研究[J]. 科学学研究, 2011(6).
- [48] 曾婧婧, 胡锦涛. 政策工具视角下中国太阳能产业政策文本量化研究[J]. 科技管理研究, 2014(15).
- [49] 邱娜. 区级政府行政职能实现途径的文本研究[D]. 华南理工大学, 2015.
- [50] 叶贵仁. 乡镇行政年历: 一个解释性框架[J].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 2009(5).
- [51] 张文鹏, 王健. 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校体育政策的演进: 基于政策文本的研究[J]. 体育科学, 2015(2).
- [52] Huang C, Su J, Xie X, et al. A bibliometric Study of Chin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ies: 1949-2010. *Scientometrics*, 2015, 102(2): 1521-1539.
- [53] 马亮. (2014). 政府部门的权力: 以国务院机构为例[C]. 2014年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经济学系年会论文, 10-26.
- [54] 黄萃, 任弢, 李江等. 责任与利益: 基于政策文献量化分析的中国科技创新政策府际合作关系演进研究[J]. 管理世界, 2015(12).
- [55] 胥轶, 陈敬良, 宗利永. 我国省域文化产业行业布局差异化研究——基于政策文本内容的2-模网络分析[J]. 技术与创新管理, 2016(1).
- [56] 马捷, 锁利铭, 陈斌. 从合作区到区域合作网络: 结构、路径与演进——来自“9+2”合作区191项府际协议的网络分析[J]. 中国软科学, 2014(12).
- [57] 王海鑫. 基于关联网络的我国科技政策体系结构与变迁研究[D]. 清华大学, 2015.

(责任编辑 方 晋)

Approaches and Trends of Public Policy Documents Research

Ren Tao Huang Cui Su Jun

[Abstract] Many scholars paid attention to Documents (wenjian) since the play a crucial role in Chinese political regime. In this literature review, we clarify the basis and logical start of this kind of researches after introducing the concept and function of document. We argue that present researches approach is divided into five approaches: semantical and syntactical approach, pragmatics approach, policy content approach, scientometrics approach and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approach. And then, we find that public policy documents research is experiencing a trend of qualification, big data and attribution.

[Keywords] policy document, textual research, social network, research approach

[Authors] Ren Tao is PhD Candidate at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Huang Cui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Su Jun is Professor at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